

走出宗教起源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读《宗教概论》有感

翟志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翟志宏(1960-), 男, 河南南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宗教学、基督宗教与文化研究。

[摘要]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是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复杂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从19世纪宗教学建立以来, 提示宗教起源之谜就一直是众多宗教学家和哲学家为之努力的目标。段智德先生新近出版的《宗教概论》, 在总结这些理论探究的基础上, “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做出说明”, 从“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生存需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出发, 在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上提示宗教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以及更为基础的“动因的动因”, 为走出宗教起源的迷宫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 宗教概论; 宗教起源; 阿里阿德涅之线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409-06

揭示宗教的起源与发展, 构成了对宗教这一社会现象本质认识的一个基本维度。在宗教学于19世纪后半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成为宗教学家们探究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一项基本内容。在随后的100多年中, 众多的宗教学家从不同方面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多角度和多方位的探究, 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观点和看法。虽说这些观点和看法并没有成为关于宗教起源之谜的最终解决方案; 但是这些以非神学的立场对宗教历史根源的探究, 则从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展了我们对宗教本质、特别是对宗教起源问题的认识。那是我们在走向宗教之谜真相的道路上的推动力, 是人类认识深化的一些重要的阶梯。段德智先生在近日出版的《宗教概论》(以下引述简称《概论》)中, 以这些探究为基础, 对20世纪宗教学关于宗教起源和发展的思想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整合, 为我们进一步寻找走出宗教起源之谜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提供了富于启发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思路。

一、一个“至为复杂又至为重大的问题”

宗教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现象, 不仅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中, 而且也是与整个人类的历史相伴始终的。在各大文明的源头, 我们都可以清楚地找到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的原始形式, 它们构成了最早的人类文化现象之一。只有顺着这样的源头, 我们才能摸清宗教的走向, 探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最终的归宿。因此, 当19世纪中后期各种宗教材料以客观的形式汇集在人们的视野中、使得人们可以以一种非神学的方法建立起“以真正科学”的名义进行研究的宗教学科的时候, 对宗教的历史根源、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的探究和说明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宗教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

基本理论部分,成为宗教学研究的一项主题。

因此,以科学实证的方式探究宗教的历史发展和早期根源,就构成了对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思考的一个基本维度。这也是现代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在其 1878 年出版的《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在缪勒看来,宗教的起源和产生问题,是宗教学最根本的问题,在宗教的研究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宗教学成为缪勒主要的学术志向的时候,他就把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为他的宗教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作为他探究宗教本质的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他相信,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与宗教的本质是息息相关的,要想对宗教的本质即“宗教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追溯它的起源,然后在其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把握它”^[1](第 14 页)。

认识到宗教起源与宗教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成为对宗教本质探究的一条基本方法,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认识论原则;而且这种溯源性探究本身也表明了它的理论意义,构成了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的基础。正如段德智先生在《宗教概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宗教起源问题是宗教研究中至为复杂又至为重大的问题,不仅同宗教的本质问题紧密相关,而且也同宗教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紧密相关,甚至同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历史发展紧密相关”^[2](第 2 页)。因此,宗教探源问题从学科建构到人类的自我认识上,都体现出了它的理论意义。

把“宗教”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不能将“宗教启示说”作为理论探究的“工作假定”,因而宗教产生的源流和历史演变就会成为认识“宗教是什么”的一个切入点。而且,在实证的意义上来探究宗教的起源的研究,是对内在于宗教传统之中的神圣渊源说的突破,表明了关于宗教的科学的建立。缪勒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揭示宗教观念的起源,但是不能既利用物神理论的常规,又利用原始启示论达到我们的目的”^[1](第 114 页)。我们只有在彻底舍弃“宗教启示说”之后,才能够拨开笼罩在这个问题之上的历史的、神话的或神学的迷雾,也才能够找到揭示宗教起源的真正道路。段德智先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表述,他说:“对宗教起源问题的探讨,无疑不仅会有助于宗教起源问题上的正本清源,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宗教启示说’出现的动因作出深层次的说明。”^[2](第 3 页)更为重要的是,当以科学的精神探究宗教的起源时,就会沿着宗教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规律,达到对宗教的本质的科学认识。因为任何宗教都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一旦拨去它在起源问题上的“天启”或“神启”的外衣,就会发现某一宗教对它所崇拜或信仰的超自然的实在或神圣对象,都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究和追寻的过程。因此,当缪勒找到古代印度宗教的最早萌芽是从自然现象中生发出来的“无限观念”时,他就会发现,印度古代宗教的历史就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寻找它”的历史,就是在有限中寻找无限、在已知中寻找未知、在自然力量中寻找超自然力量、在可见的事物中寻找不可见的神灵的历史,从而推动了印度宗教从单一神教走向多神教和惟一神教并最终走向无神论的演进与发展。随着对其早期萌芽和历史演变的揭示,人们关于印度宗教的内在特征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当然,探究宗教起源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它与人类的自我认识乃至对人类历史的认识都有一定的关联。如果宗教的起源与人有关,是在人类的生存、“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从宗教的源头考察宗教,便势必有助于我们对人自身的两重性,如有限性与无限性、依存性与能动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等,有一个更为鲜明又更为深刻的体认,对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宏观的‘长时段’的把握。”^[3](第 3 页)这也是《概论》之所以把起源和发展问题作为本书开篇首先阐述的一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挡不住的诱惑”

《比较宗教学史》的作者夏普在谈到比较宗教学(即宗教学)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时,认为它起码要依赖于三个基本的条件:一定数量的资料、整合资料的方法和作为研究动机的好奇心^[3](第 2 页)。正是这种对未知之谜不可遏制的冲动和好奇心,构成了人们对宗教原始根源探究的内在动因。特朗普

也把这种对“开初事物”的强烈着迷视之为西方思想的特征,这种迷恋促使人们不遗余力地去发现“万事万物是如何开始”的,并通过这种“开始”来“说明后来发生了什么”^[4](“前言与致谢”)段德智先生把它看做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动物的人类的认知本能使然”^[2](第7页)。当然,对宗教源流的探究并不仅仅是来自于人类的心理欲望和对未知的好奇,它还有着理论的需要,有着对宗教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揭示以及对宗教本质认识的需要。正是这些心理的好奇和理论的需要,构成了对宗教探源的诱惑,促成了从斯宾塞和缪勒到杜尔凯姆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众多思想家和学者们的探究热情。

在近现代的意义,以非神学的方法对宗教的起源进行探究,是由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一批思想家们所推动的。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思想酝酿着革命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在欧洲流行并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先验哲学的“进步观念”,经过达尔文进化论的改造,而被包容在历史的、进步的和演化的这些“完全是现世的范畴”之中^[3](第31页)。这种变革对于型塑人类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在新的原则之上重新考察了整个人类文化,目的是要了解人类精神的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的起源、发展和目标”^[3](第32页)。近代的宗教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进化论中找到了“一种单一的指导性的、既能满足历史的要求又能满足科学的要求的方法论原则”^[3](第33页)。

因此,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众多的宗教研究者们就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建构他们关于宗教起源的理论的。作为第一个把进化论思想引进到对宗教起源研究中的学者,英国19世纪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4)坚信,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宗教观念,都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因而任何宗教必定起源于某种最为简单和最为粗糙的观念。他把人类最早的宗教信仰形式归结为是以鬼魂说为基础的“祖先崇拜”或祖灵崇拜,认为祖灵崇拜是“一切宗教的根源”^[4](第42-43页)。与斯宾塞处在同一时代的爱德华·泰勒(E. Tylor, 1832—1917)和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 1823—1900),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关于宗教起源的看法。享有近代人类学之父声誉的泰勒,把起源于早期人类梦幻的灵魂观念进一步扩展,提出了宗教最早的表现形式是“万物有灵论”的观点。而作为宗教学真正创始人的缪勒,则通过对古代印度早期宗教文献的深入研究,认为“无限观念”才是原始宗教最早的“胚芽”,才是推动人类宗教信仰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史前动力”。稍晚于他们、而以《金枝》闻名于世的英国宗教人类学家弗雷泽(J. G. Frazer, 1854—1941),则通过人类最原始的迷信形式“巫术”来解读宗教的起源,认为巫术先于宗教并成为宗教产生的根源。

人类在进入20世纪以后,虽然从进化论的和理性主义的立场探究宗教的起源问题,已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一种主流思想,但出现在20世纪宗教研究者们身上的这种探源的热情,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19世纪的前辈。只不过是这个时期,“人们开始从宗教还原论的和前理性的立场思考宗教的起源问题”^[2](第9页)。宗教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 Durkheim,)把宗教还原为社会无意识的“集体表征”或“集体仪式”(“图腾崇拜”),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把宗教还原为原始人的心理需要或性冲动(俄狄浦斯情结)的需要,神学家奥托把宗教的起源归结为非理性的“独特的宗教体验”,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心理学家荣格等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宗教的起源做出了说明。

虽然这些在100多年来倾注了众多学者大量心血的探究还在继续着,还是一种“未定之数”,但这种探究无疑在不同的方面深化了我们对宗教起源问题的认识。《概论》在评述这些探究之后指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不仅提出了宗教起源问题上的两条思路:理性主义的和进化论的以及非理性主义的和还原论的,而且还提出了人性深层结构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2](第9页)。这种从宗教起源的探究进入到对人性深层结构的探究,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任何关于起源问题的探究都不能或不应停留在理性思辨的水平上,而应该另辟蹊径,把探源的活动置放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对于发生在几万年前的人类现象来说,解决问题的思路应从能够相对真实地展示人类早期存在状况的考古学挖掘中去寻找,“为要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真正引向‘坚实的基底’(即‘坚硬的事实’)乃至引向深处,我们就必须进入或回到另一个领域,这就是有关史前时期的宗教考古领域”^[2](第11页)。《概论》阐述了宗教考古的认识论意义,指出它对宗教起源探究的若干

指向作用。首先,任何的宗教观念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是在人类进化到智人的某个阶段形成起来的;其次,灵魂观念或灵魂不朽观念是人类最早的(或最早的一个)宗教观念,从而使得我们对宗教的探源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其三,宗教遗迹与氏族遗迹是同期或同步出现的,由此我们可以找到赖以解释宗教起源的社会历史条件^[3](第12-13页)。

《概论》借助于现代宗教考古的成就及其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对宗教起源的两大源头——宗教借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论根源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就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由于宗教是由人类自身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它的起源必然与早期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状况有关。这种生存状况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二重化的关系。原始人类超出动物界并形成与其他动物区别的最初的和最为重要的标志,是他与自然界发生了某种“关系”——自然界成为某种被意识到了的、外在于他的存在或力量。这种对自然界的被意识到了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对自然界的“动物式的依赖、顺从和服从”,表现为无限的恐惧感、依赖感和敬畏感。在这种原始的依赖、敬畏和恐惧中,产生了人类宗教信仰的最早萌芽,“人对自然的依赖感成了宗教的根本基础和中心内容,自然崇拜或以自然崇拜为本质规定性的自然宗教成了人类宗教的最初形式”^[2](第17页)。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支配欲和利用欲”。因为任何人类的活动都是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活动,当这种活动涉及到了自然对象的时候,必然成为一种包含了认同、支配、利用、征服等欲望在内的有意识的主动活动。人的活动所具有的人格化力量,他同化自然、超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欲求,无疑是宗教观念和神圣观念形成的另一个“根本动因”^[3](第16-20页)。《概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做出了更为肯定的评价,认为它“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的自在自由的本质”,反映了“自然的神化”的本质在于自然的“人化”,在于人的“自我神化”。

当然,人与自然的这种二重关系是整个人类体验到的关系。也就是说,原始人类是以群体的形式、而不是以个人的形式意识到并表现出他们对自然的这种二重化关系的。这是人类的生存论事实,即人类是以集体的形式面对自然界的。这反映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即整个人类群体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本质。因而,当人类在神化自然界的同时,他必定也对超越他之上并是他赖以生存的各种社会关系产生深刻的印象,从而萌生出依赖、敬畏乃至利用、支配的感情和欲念。神化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实在因之成为早期人类生存的“需要”。《概论》对宗教得以产生的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指出人类最早的制度性宗教,是以肯认和“神圣化”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氏族制度”——为根本内容的“自发”的“氏族宗教”或“部落宗教”,其核心内容是“图腾崇拜”和“始祖崇拜”^[2](第23页)。

《概论》不仅将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一种既成事实进行了深刻探究,而且对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作了动态的、认识史的研究。这样从发展的立场看待宗教观念的产生,从而就把宗教的起源置于人类自身的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之中了。

由于任何宗教观念不仅是人类长期认识过程的产物,而且也是人脑的产物,是基于人脑的抽象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形成起来的。因此,《概论》一方面对宗教观念形成的“历史道路”——在长期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进行了探究;另一方面也对宗教观念产生的认识论前提——以人脑为基础的直观能力和抽象能力的演进和获得作了历史性的考察,指出任何“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都经历了一个作为思维能力物质基础的脑量的演变和增长的动态发生学过程,都是“原始人类在几百万年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遗传性获得’的结果”。这可说是人的认识能力以及宗教观念产生的必要物质条件^[3](第24-32页)。人类正是在这种漫长的脑量增长过程中,形成了“最简单的抽象”能力,进而产生了灵魂观念、神灵观念和神性观念等宗教观念。

《概论》参考现代宗教考古学的最新成就,对宗教起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论根源作了全面的考察,把自然宗教和氏族宗教作为宗教最原初的信仰形式和社会形式。以此为基础,《概论》从宗教演变的两个维度——从“自然宗教”到“多神教”和“一神教”以及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对宗教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阐述。这些考察对于我们理解宗教的本质、理解

宗教的源头和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基础在于历史”

宗教学在其 100 多年的发展中,关于起源问题的探究之所以成为它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研究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们所采纳的反启示主义立场,得益于他们把实证主义方法和其他非神学方法在宗教起源研究中的成功运用。这在宗教学建立的早期尤为明显。夏普指出,对各种宗教材料的非神学研究虽然早已开始,但只是到了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这些材料才得以系统化,才以确定的方法被整理,从而对宗教的研究才成为一门科学^[3] (“前言”第 2 页)。而在宗教学建立的早期,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方法是由达尔文提出,并为斯宾塞充分阐释的进化论方法。夏普在评价进化论的意义时说到,19 世纪中后期的人们在进化论的“新的原则之上重新考察了整个人类文化,目的是要了解人类精神的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的起源、发展和目标。宗教也不例外;确实,进化论以首屈一指的活力和强度在宗教领域中得到了贯彻”^[3] (第 32 页)。

这种方法不仅在总体上对宗教学具有建构意义,而且在对起源问题的研究上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19 世纪后期关于宗教起源和发展的众多理论,都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的。虽然在 20 世纪,在宗教起源和发展问题的探究中出现了反进化论的倾向,人们不再以进化论的模式作为认识宗教起源和发展的惟一模式,但进化论作为促动因素仍然是支配探源问题的一条隐性原则。而与此同时,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了多方面的说明和阐释。可以说,非神学方法是近现代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对于宗教起源和发展的探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些众多的方法在从不同方面深化我们对宗教根源问题探究的同时,也带来了认识上的相对性,带来了结论上的莫衷一是。正如夏普在概述宗教学方法的演变时所指出的,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和宗教哲学等这些 20 世纪所兴起的宗教学分支学科,每一门“都有它自身的研究途径,都有适合于它自身的一套方法”。如果说在 19 世纪人们还能够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提供的标准去评判各宗教的‘相对的高低优劣’”、还可以用它来探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话,那么到 20 世纪以后,运用在各分支学科中的方法,则“没有一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3] (“前言”第 3 页)。研究宗教学及其起源问题的方法,呈现出了多元化和相对化的局面。特朗普对这种方法上的相对性作了“个人主义”的解释,他说,“之所以采用一种方法,是因为选择了该方法,认为它是最佳或最有用的方法,甚至是因为它对一位学者或著述者正在展开的一系列论证有用。……选择一种(或不止一种)方法早已是个人的事,它反映我们自己打算(或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情”^[4] (第 9 页)。以这样的一些方法探究宗教的起源,势必会导致结论上的相对性,导致特朗普所说的“宗教起源问题在当代尚未找到答案”。

因此,为了消除思想方法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失望,消除它们的“个人主义”倾向及其在结论上的相对性,特朗普认为我们应该转向事实性,转向考古学所给予我们的实在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思想史转向考古学,估量考古学研究现在能向我们提供的全部资料”^[4] (第 179 页),让考古学所挖掘的器物自己“说话”,“表达”出宗教最原初的形态。特朗普在表述现代考古学成就及其使用的测定年代的手段之后,就它的宗教学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依据宗教考古学的材料,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认识和解释人类最早的宗教范式或原则^[4] (第 208-242 页)。当然,特朗普认为“石头”并不会说话,考古学所挖掘出来的“器物”有什么样的宗教意义,还依赖于我们对它的解释和说明。因此,特朗普认为这七种早期宗教范式或原则多少都具有“想象”的成分。

《概论》在阐述探究宗教起源的方法论意义时,不仅注意到了众多研究方法的有限性以及考古学阐释的“想象”成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宗教探源方法所具有的建设性的认识论意义,做出了全面而中肯的分析,并提出了进入宗教历史源头的更为合理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即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由于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群体,它的产生既需

要一定的认识论条件,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为了“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作出说明”,我们必须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出发,对“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生存需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进行深入的考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维度上,在探究宗教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的同时,揭示宗教更为基础的“动因”或“动因的动因”。也正是如此,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学、宗教现象学等分支学科的具体方法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发挥”,宗教比较学和宗教史学这两种宗教学的主要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才能够得以“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把握和运用”^[1] (“前言”第 67 页)。

《概论》在阐述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宗教本质及其源头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的同时,也对宗教考古学所提供的认识论意义做出了适当的评价,指出对史前宗教考古的解释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色彩”和“不确定性”,但考古学所属的“科学共同体”能够把这些“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可以从中“获得某种相对可靠的、相对确定的信息”^[2] (第 13 页)。《概论》所阐述的这种方法论原则以及对考古学结论的评价,对于我们认识和解释宗教的本质及其源流和历史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指向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英] 麦克斯·缪勒.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 金 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2] 段德智. 宗教概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3] [英] 埃里克·J. 夏普. 比较宗教学史[M]. 吕大玲,何光沅,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4] [澳] 加里·特朗普. 宗教起源探索[M]. 孙善玲,朱代强,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严 真)

The Line of Ariadne: Going Out of the Religious Origin's Maze

ZHAI Zhi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I Zhihong (1960-),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astern philosophies and religious studies.

Abstract: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 is a sophisticate and important theory's problem in the studies of religion.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philosophers have been tried to open out the riddle of the religious origin. In Introduction of Religion that being recently pu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summarizing these theory's achievements, Mr. Duan Dezhi puts forward the basic thought of “the logi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story”. For the sake of “elucidating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regul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innate character of religion from the deeper level of structure”, he said, we must disclose the efficient cause of religion and its more basal “efficient cause” on history degree and logic degree. The explanation is set out from “the survival demands of realistic historical human-being and the history evolution of social mode of production”. This standpoint provides the basic methodology principle and the theoretical way that inspire our thinking for our going our of the maze of the religious origin.

Key words: introduction of religion; religious origin; The Line of Ariadne